

## 附录：颜惠庆日记

(1949年1月28日——2月27日)

1949年1月28日，上海报纸登载了李宗仁代总统致电中共领袖毛泽东，吁请进行和平谈判的消息。同日，行政院院长孙科及其同僚离开南京，飞赴南京政府拟将迁往的广州。然而，驻华外交使团决定继续留在南京，以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29日是春节，放假。当天晚上，行政院秘书长端木恺先生来访，适我未在。我猜想将有重要的事情。翌日(星期日)早晨，我前往端木先生在上海的办公室，得知李总统计划加紧进行南京与中共之间的和平谈判。他通知我，李代总统的机要秘书今天会来见我，捎来代总统的信。

当天晚上，甘介侯先生(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与我一同被羁押在香港酒店)携李代总统的信来访，邀请我参加和平代表团，前赴北平。其他4名成员有：章士钊、江庸(他们都在旧北京时代任过司法总长等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陈光甫，和江苏省临时参议院议长冷遹。甘介侯通知我，第二天到外滩的中国银行总部，参加李代总统设的午宴。

星期一中午，我来到中国银行总部，已有很多人在这里了。除了拟议中的5名代表团成员外，还有孙科、吴铁城将军、司法院院长居正、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前驻苏大使邵力子，以及甘介侯先生等。

李代总统分别与各位政要交谈，后来，又邀请拟定的和平代表团成员专门谈话。他向我们概括说明了代表团的职责，即：前往北平，力劝中共领导马上开始和平谈判，这是我们此行的首要也是唯一的使命。实际的谈判任务将由另外的代表团承担。事实上，这

次代表团的 5 名成员,加上邵力子先生,已经被指定了。

就本人而言,我表示愿意成行,但是有两个条件:一是政府必须与对方安排妥当,以保证我们将受到接待(而不是在到达后,才发现被拒之门外);二是,我们能见到中共的最高领导(而不是仅被他们的秘书所搪塞)。代总统允诺一定会尽力使我们的愿望得到满足。

当天晚上,一位老朋友来访,他刚从香港来到上海。他认为中共会热情接待我们,因为他们总是尊重并且十分了解民众的意愿,而要求和平正是人民的愿望。

2月1日,我邀请同行者至家饮茶,交换看法,并安排旅程。李代总统似乎急于让我们马上启程。可是,代表团的两名成员出于个人的原因,好像尚未决定接受总统的提名。

这天晚上,我收到一些有关国际政治局势等方面的机密信息。

2月3日,在我家第二次聚会时,提出了新的人选,以代替无法接受总统提名的陈光甫和冷遹先生。很遗憾,两位新人选中,有一位工业巨头,当时并不在上海;另一位是教育家,由于个人原因,也拒绝了邀请。于是,又提出了另外的两个人。

由于代表团的成员必须是中共同意的,而且,第一次拟定的名单已通知后者;因而,若要更换,只能等等看。

2月8日,邵力子和甘介侯先生来访,称李代总统又来到上海,第一次拟定的五人名单已获得中共的同意,我们将于第二天早晨启程。第二次提出的替补人选,尚未接到答复。

这天晚上,我们3人在一处私人宅邸中见到了李代总统。他告诉我们,可在任何时候乘坐专机启程,不必再等中共有关替补代表的通知。

我们起程的时间被推迟了两次,直到2月13日,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才最终成行。

从和平代表团的最初酝酿直到离沪经青岛赴北平,前后两周内,我们3人,或者说4人(其中邵先生作为引见人,总与我们在一起),接受了不少的来自国内外新闻界的采访,有时是我们所不希望的。

2月13日 星期日。很多人到机场送行。行李很多，还有几位非代表团成员乘客。卢九(Jimmy Louie)也在机上，他代表中国航空公司(C.A.C.)。天气十分好。飞机起飞顺利，飞行平稳。沿途景色，无论陆地还是海洋，都美不胜收。在机上用午餐。下午两点，抵达青岛。机场设备已拆除。飞机的一个轮胎被扎破了，只好在青岛过夜，等待从上海运来新轮胎。过了好一会儿，耿市长才带着车接我们进城。住进的宾馆，原为德国总督的宅邸，只用炭炉取暖，非常冷。大陆商业公司有关人员前来，还有华兴棉纺厂的经理们。我们请他们找家外国旅馆，以便过夜。

先至周公馆，后来，决定在莱阳路的荷兰别墅租房间。那里干净、温暖，客人很少，服务周到。市长在宾馆招待我们进晚餐，然后我们一行前往荷兰别墅。是夜，十分温暖舒适。

青岛的难民很多，但是城市很安静。还有很多美国人仍然留在这里。飞行延迟之事已通知北平。

2月14日 星期一，晴。上午10点半，抵宾馆。从那里，我们的车队前往机场。但起飞时间推迟了，因为北平方面对我们一行中代表只有4人而乘客却很多感到不解(这些乘客中包括有几位秘书，一名医生，代表们的家属，以及一些非官方的联络人员)。在机场进午餐后，下午两点，飞机起飞。天空晴朗，但下面的大地被冰雪覆盖着。下午4点半，飞机抵达北平，副市长徐冰前来迎接。稍事休息后，我们向城区进发(机场坐落在西直门外的西苑)，代表们到六国饭店，秘书等人则去前门外的旅馆。后来，他们也到六国饭店与我们会合。这里的人口处和每层楼，都有许多士兵担任保卫工作。中共领导租用了这座饭店，也有一些外宾住在这里。我们在东兴楼用茶和晚餐。席间还见到了新、旧联络人员(黄先生、刘先生)，后来，他们与我们一同返回南方。大陆商业公司的齐经理来电话，但因太晚未能见到他。

2月15日 星期二。北平市长叶剑英将军来访。他住在饭店的三层，我们在四层。后来，我们四人到他的会客室，与他会谈。叶市长是广东人，曾在云南军校学习，有着不平凡的戎马生涯。他在汉口期间与卢九相识。叶将军举止文雅，听得多，谈得少，在笔

笔记本下我们想要说的话。他一点也不让人感到严厉、生硬,而是十分和蔼、幽默。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作为向导和引见人的邵力子先生,都转达了我们带来的信息,那就是:人民希望和平,我们恳请中共领导同意开始谈判。在座的三位代表有我、章士钊和江庸。邵力子先生曾多年在西安,是国民党的重要成员,还出任过驻苏大使。他认识中共的一些领导人,他们曾在他任大使期间访问过莫斯科。他还参加过在重庆举行的国共谈判,这次谈判失败了。由于邵先生与中共主要领导人都很熟,他的出面对我们帮助十分大。

叶市长彬彬有礼,承诺把我们带来的信息转达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先生,他们当时都不在北平。

下午,我们将名片留在市长、副市长处。然后,赴前日本驻华大使馆(现为解放军和傅作义部队协调委员会的所在地)参加一个规模较大的宴会,出席者还有几位女士。宴会厅里摆了四张桌子。在这里我们第一次见到了林彪将军。与宴的还有傅作义、邓宝珊,以及聂荣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傅作义将军的同事邓宝珊将军曾作为全权代表,与解放军达成了停战协议,结束了北平的被围困状态。在旧北平的日子里,我与傅将军很熟。20多年前,我曾是他邀请到绥远的客人之一。当时,华洋义赈会在包头正式开始启动一项灌溉系统工程,从上游引黄河水入河渠,再将水排入黄河下游。傅将军显得非常健康,但举止有些拘谨。宴会气氛很是轻松愉快,在“干杯”声中,大家开怀畅饮。食品都是典型的老北京风味,包括很多的名菜佳肴。

回到旅馆,我们收到杜月笙先生的电报,催促我们帮助解决恢复海运的问题。

2月16日 星期三。很多旧友和熟人来访。其中包括原来家中的侍从,特别是清华大学附近我们那座喇嘛庙的看管人。此外,客人中还有银行家、实业家、商人和一些女士。所有来访者都说,在围城期间,没有一位朋友或亲戚受到伤害,也没有任何建筑遭到损坏。正如我们乘车在街上所见到的那样,当地生活十分正常。中共方面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汽车,司机和向导身着制服。这里没有私人汽车,拥有车辆须得到专门批准。我们随意四处走

动,拜访了北平的很多中共高级官员。

当天晚上,傅、邓二位将军邀请我们至傅公馆共进晚餐,那是一座位于西城的十分舒适的西式宅第。其他的客人还有:董必武,以及叶剑英、林彪、聂荣臻等将军。席上,精致的饭菜,盛在漂亮的瓷制餐具中,佐以醇香的米酒。我们聊起了绥远、山西煤矿、大同云冈石窟等,是晚,傅将军十分豪爽。

塘沽永利碱厂经理来访,报告说在最近的战事中,工厂的损失极小。惟一严重的损失是,有大约十万条麻袋被国民党军队拿走做了沙袋。在中共的管理下,工厂重新运行。根据亲身经历,他建议商人和实业家,应该毫不犹豫地去见共产党的官员,让他们关注自己的意见或苦衷。因为,他发现中共官员非常通情达理。这位经理遇到的困难是手头没有现金支付工人薪水,只能代之以实物。

2月17日 星期四 与同事交谈,取得共识。我们应采取坦率和公允的态度。此外,我们应要求得到机会,见到尽可能多的领导人,无论他们在北平还是其他地方。

我应邀与叶市长单独会谈。谈及苏联的历史和经验,我对国内外事务提出了一些个人的建议。我向他询问了有关宗教自由的问题,他回答得十分坦率。他讲道,他的党赞成宗教自由,党的领导人在许多场合都曾提到了这一点。只不过,这个自由必须是相互的。即是说,信教者不会受到干扰和迫害,不信教者也同样如此,不得对不信教者施以精神和肉体的压力,迫使他们信教。他所指的,可能是在教会学校中盛行的旧的规则和做法。

我特别强调,国家需要立刻实现和平,如果中共准备进行和平谈判,就要尽快地讨论并采取一定的步骤、程序和方案。广播宣传和相互指责是无法实现和平的。

我还强调,如果国内和约得以缔结,全国人民都会欢欣鼓舞,并拥戴领导者;同时,这也将极大地提高我们的国际声望。尽管一些所谓的世界领袖在兜售“冷战”和“热战”,可是人民厌倦、厌恶战争。中国国内和约的缔结,将加快世界和平的到来。

叶市长诚恳地征求我的意见,并听取我对解放区的见闻和印象。我首先谈到,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一些他们不熟悉的问题。

以前，他们主要是与农村问题打交道，很多人都承认他们为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办了许多事情。但是，现在中共必须面对城市问题，与完全不同的阶级、阶层打交道；对于这部分人，他们的经验很少。城市居民的大多数是小商人，其中一些人是合股公司的股东，这种经营方式在我国尚属革新之举。这样的股东绝大多数只是小资本家。事实上，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新兴工业甚至不可能存在。将他们视为资产阶级是错误的。因此，需要保护这些处在发育阶段的工业。

我还指出，我不能确信中共具有很多富有经验、能够管理好大城市事务的专家。我向他们介绍了我所了解的目前供职于上海市政当局的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有经验的人士，并对他的党是否有如此之多的能干的管理人员表示怀疑。叶市长哈哈大笑，承认我是对的，并就他这里的情况指出，迄今为止，只有他及其助手两人作为重要官员参加了市政府，其他任何重要职位几乎都没有变动。

我们就这样结束了会谈。我再次提出了希望面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先生的请求，他说已经发出了电报，很快就会得到回音。

当日下午，我与邵先生，还有我的医生焦（湘中）大夫，访问了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与这两所大学都有过密切的关系。它们都在城外，离颐和园很近。我们非常想知道，新政权管理下学校的情况如何，以及在战争期间，它们是否遭受了损失。

在燕京大学，有一些战士驻扎在校门处，其中的一位战士陪我们来到司徒雷登的住所。在那里，我们见到了代校长陆志韦先生，还有一些教授和夫人。宗教学院的赵院长也在场，请我捎一篇用英文写的文章到上海，文章中主要讲的是中共反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他希望这篇文章能在纽约发表。据我们所了解，学校正在像平常一样地开展工作，新政权并没有对师生实行任何限制。只是要求外籍教员不要离开校园，作为一项“保护性”措施。除此之外，每件事情都很正常。

然后，我们来到清华大学，拜访代校长冯友兰，几位教授不期而至，很快形成了一个座谈会。我们得到的消息，与在燕京大学获

得的一样，不过，在校门口和校园内都没见到有士兵。尽管中共是从学校附近的西郊包围北平的，可是这两所大学的建筑物，几乎都没有受到任何破坏。教学像往常一样在进行，学生们在校园内四处走动，仿佛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后来，我们回到上海后，已离开学校的校长告诉我们，学校里的历史、经济和法律等课程都有所变动，我们当然无法证实这一说法。

在返回旅馆的途中，我们路过那座喇嘛庙，它已租给清华大学，用作教授的住处。但在战争期间，为了安全起见，一些住户又搬回了校园，至今这座庙还是空的。

当天晚上，我们应邀赴一座大型剧场，观看中共排演的一出歌剧。乐队席和楼厅后排有士兵坐着。我们这些客人在主人的陪同下，坐在楼厅的前排，这里备有茶点。在场的还有一些女士和东道主的夫人。这出歌剧的剧情很简单，讲的是一个恶霸地主，他的管家无耻地敲诈佃户；他的儿子游手好闲，企图奸污农民的女儿。最后，在一位共产党员同志的帮助下，联合起来的农民，惩处了这个恶棍。舞台布景十分逼真，灯光效果也很好，表演尤为出色。演唱的曲调虽然哀婉动人，但音域有限，缺乏变化。其旋律似乎取自很受人喜爱的陕西民歌。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战士们端庄的举止，无论进出剧场，还是等候幕布的拉启，他们是那样的安静、有修养，如此严肃的军纪绝非一般士兵所能办到。

当天我们在旅馆，见到扶轮社的成员正在聚会，聚会上有例行的演唱等。参观燕京和清华大学后，回到旅馆；中华基督教会的斯科特主教来访。我们聊了一会儿，得知他的工作一如往常在进行，没有受到任何干扰。

2月18日 星期五。我的很多私人朋友和同事来访，其中有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院长。有一对年轻夫妇是当地司法界中的书记员，他们说，旧法庭的职权已被中止，成立了人民法院，由年长的前法官主持。但公众对这样的新机构不甚满意，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被告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且目前尚缺乏指导这一改革的法典和案例。总而言之，被告是少数，他们得到公正对待的机会也就较少。

今天中午,我邀请一些老朋友以及商界和银行界的同事到一家著名饭店吃烤鸭,由于价格不菲,在这里进餐的只有我们这些人,但肴馔和酒水,佳美如常。

下午4点,我们应邀与中共华北局的主要领导就全国和平问题交换看法。中共方面的主要发言人是董必武先生,他是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曾是旧金山联合国宪章的共同签署者;还有著名的军事领导人林彪将军。董先生表示赞成和平,但必须是真正的和平,林将军表明,他更赞成彻底的、百分之百的革命。显然,这些话的意思是,他们希望把革命进行到底,取得一个永久的和平。他们似乎很担心国民党一方会耍手腕,旨在争得喘息机会,以便重开战端。林将军担心的是,不成熟的和平,会使革命失败,断送理想和革命宗旨。我们的论点是,从历史上看,没有任何一次革命百分之百地达到了目的。在赞扬了他们的精神和勇气的同时,我们还指出,一般人民无法承受这样残酷、激烈的战争,因而,完全的革命无异于损坏整个的国家。作为大众和国家遭受苦难的见证人,我们这些长者不同意这样强硬的立场和为完美的和平付出的代价。

当天晚上,华北局邀请我们在旅馆共进晚餐。我们见到了其他的华北局成员,还见到了前北平市参议会议员兰先生。

一些外国新闻记者欲采访,但被我们推托了,因为没有事情可奉告。

2月19日 星期六。开始阅读中共领导人送给我们每个人的很厚的书。其中有毛泽东先生的公开谈话、报告和评论,内容包括共产党的主张和理想,社会事业和实验的成功,国共抗击日本侵略的联合军事努力,共产主义革命等。还有他接见中外记者的谈话,以及关于经济、财政、合作社等问题的文章。其中大部分都是在30年代和40年代初发表的。但是,首篇文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发表于1947年12月25日,文章一开始就谴责了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战争,并说他们必须而且也一定能够打败蒋介石。

上海中央银行的一位行员讲到,他出差至北平,为战事所阻;现在,应当地政府所招,供职于人民银行,受到优厚的待遇。

我们偶然发现，国统区的一些名门世家的成员，现正在北方担任重要职务。

我们姻亲中的很多女士来访，得知她们并未因政权的更迭而出过事，总而言之，无论是物质上还是其他方面，围城几乎没造成什么损失。

通过与邵力子先生交谈，得知他曾在西安政界、教育界任职多年，是国民党的著名人士，与黄埔军校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上文所述，他在莫斯科任过大使，在那里结识了一些正在苏联学习或居住的中共领导人。

今天较为清静，叶市长身体有些不适，我们也没与其他领导人会面。我们每个人得到一个精美的铜墨盒，上面镌刻着叶市长的题字，作为纪念品。

2月20日 星期日。由焦医生开车，至西城圣公会教堂。我们提前到了近一个小时，礼拜仪式尚未开始。于是，我们决定到南城去观光。汽车沿着骡马市大街行驶，周围是繁华的商业区和会馆中心。返回内城时，路过师范大学，进和平门，回到教堂。两位中国牧师主持礼拜仪式，唱诗和诵经的水平都很高。大约有60名女信徒参加了礼拜，其中有一位英国女士。与我交谈的还有一位英国牧师。教堂门口既无士兵，也无警察。

我的一些天津老朋友，在办企业过程中与我有过密切的合作，因战事滞留北平。他们邀请我们到公司驻北平办事处共进午餐。老友相逢，倍感惬意。

下午3点半，在北京饭店舞厅，中共领导举行茶话会并设晚宴，邀请本市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参加。铜管乐队演奏了精彩的乐曲。我们遇到了很多的老朋友，既有先生，也有女士。邵力子先生代表我们讲话，阐明了此行的使命。其他发言者还有：燕京大学校长，清华和北京大学的教授，社会贤达，资深学者，以及著名艺术家徐悲鸿等人。所有的讲话都赞扬了新的解放者，谴责了国民党。宴会主人，还有军界人士，也讲了话，再次表达了他们的主张，即只有真诚的和平才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晚上很不平常，我们接到了前往石家庄的邀请。能有机

会见到并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令我们备感欢欣鼓舞。当然，邵力子、章士钊和江庸先生曾在重庆见过毛先生，章先生与毛先生还是同乡，年轻时代就认识。

2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我们接待了很多私人朋友，其中有在铁路部门工作的、还有前外交官、银行家等。银行联合会的官员在是否与新政府结识的问题上，态度迟疑，这是很不明智的。因为迟早他们要与新政府建立关系。我竭力劝说他们要争取主动，否则会产生误解，对双方都不利。……

下午，我们参观了美术大师徐悲鸿以中国为主题的油画展览，这个展览设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内。一位中共教员正在教室里给学生们和部分教职员讲课。最后，我们来到东安市场，买了一些书。我挑了一本英文版的侦探小说《一位外交官员之死》，啊，当然，这位外交官并没有死在北平，而是死在日内瓦的贝尔格旅馆。

为了做好明晨出发的准备，当天晚上我们都早早地回到了饭店。

2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10点半，我们乘坐专机前往石家庄。陪同前往的有傅作义将军和邓宝珊，他们在北平和平解放后，也是第一次去见毛泽东、周恩来先生。出发时，天空有些雾；但到石家庄时，天气很好，飞行只用了1个小时。中共市长和其他官员来机场迎接，我们乘坐汽车前往宾馆进午餐，并作短暂休息。宾馆与其他几座建筑都坐落在同一围墙内，是日本人在侵华期间修建的。主人们为我们准备的午餐非常好，他们建议我们在这里住一夜，第二天再前往目的地<sup>①</sup>。然而，我们宁愿立刻出发。有6辆吉普车准备载我们继续前行。沿途道路虽然很宽，但有好几段是木板铺成的。旅程很艰难，特别是要连续行驶几个小时之久。我们翻过几座山岭，又跨过数条川流，如果是在夏天，这些川流的水量一定会大得使汽车无法通过。不过，这一带的农村很有趣，景色也很优美。农民们，无论男人还是妇女和姑娘们，都显得丰衣足食。村庄里，屋舍井然，欣欣向荣。我们超过了一辆又一辆的牛车、马

<sup>①</sup> 目的地系指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译者

车和驴车。在一个小镇上，正在演出地方戏，此时尚在春节期间，镇上的主要街道挤满了人群。汽车队的出现并没有惊动他们，显然，他们以前一定经常看到这种情景。

到达目的地时，天色已黑。我们一行的安全抵达，都应归功于司机们非凡的驾驶技术和充沛的精力。周恩来先生出来迎接我们，随即招待我们用晚餐。我们好像是在一个小的院落中。食堂和接待室靠近院子的入口处，要上一个小坡。对面是伙房和勤务兵宿舍。再往里走，处在一个直角上，有一排寝室，大约有十来间，我们就在这里住了两夜。整个院落有电灯照明，房屋都是新盖的。我们得知所有这些建筑都是战士们建起来的，砖墙、瓦顶，原本做成的门窗（未涂漆），地面也是用砖或用水泥铺就的，我们睡的地方同样是用砖垒的炕，可以从下面把它烧热。每间屋子都有一个小炉子，并有长长的烟囱通过窗外。总之，房屋陈设简朴，但十分干净、舒适。为了使我们过得愉快，勤务兵做了最大的努力。

晚饭后，毛泽东先生来到我们住处，一直呆到11点钟。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他（石家庄宾馆挂有他的照片），他那愉快的神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穿着一件普通的棉衣和肥大的裤子。他与我的同事们沉浸在对许多往事的回忆中，特别是有关在重庆的日子。他的言谈十分幽默。由于刚会面，双方都没有过多地谈及我们此行的目的，但是，对毛先生给予我们这次陈述情况的机会，我们表达了谢意。周恩来先生较为年轻，具有丰富的阅历（天津南开学校的学生，还曾在巴黎、柏林和莫斯科学习过），曾在上海生活过，因而更具有世界眼光。他提醒我，当他在南开学习时，我正是这所大学的理事会主席。毛先生严厉地批评了国民党过去的所为，并表示中共愿意商谈和平，但是他认为双方在选择谈判代表时应该非常慎重。有关谈判的基础，中共已经提出了一个纲要。

在阐述国民无法再忍受战争的苦难、希望早日实现和平时，我的脑海中突然闪现出，在纪念华盛顿时，亨利·李所写的著名的颂词（战争中的第一人，和平中的第一人，同胞心中的第一人），于是，引用了这句话给毛先生。周先生聪慧地对我笑了笑，问道：“这句话的含意是什么？”我回答道：“这要由毛先生去决定。”总之，晚餐

后与毛先生的会见，非常热情友好、亲密无间和坦诚直率。我们提醒两位主人，中共总是认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们到这里正是为国民说话的，所描述的情况都是真实的。

2月23日 星期三。下午大部分时间用于休息和阅读。

再次与毛先生和周先生进行了长时间谈话。毛先生再次强调了对人民愿望的尊重，同时提出和谈的要求必须是真诚的而不是别有用心的。对他们所设想的政治变革，也进行了非正式的讨论，双方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谈到中国的共产主义究竟是国家的还是国际的，他们回答道：中国共产党肯定无疑是中国人民的，但是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相互同情，正像西方民主国家相互有较密切的关系一样。

除了讨论最重要的结束内战的问题外，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我们还向中共的两位最主要的领导人了解了他们有关银行、工业和人民法院等方面政策。他们的答复与我们在北平听到的一样，即：银行家将受到保护，只要他们获取的是合理的利润，而不是通过放高利贷牟取暴利、盘剥人民。至于工业企业，政府鼓励它们支持重新建设的规划。中共领导人承认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必须受到保护，特别要发展合作企业。另一方面，中共将取缔官僚资本。这样的主张，可以从我们在北平以及农村看到的标语，得到证实。

我们谨慎地提到，上海的中外居民对一旦战争爆发、城市面临的命运颇感担忧。他们对这样的忧虑感到意外，其作出的解释可概括如下：如果交战双方达成和平协议，上海就不会发生战事。如果解放军未能渡过长江，上海也不会有战事。可是，如果解放军渡过了大江，上海的命运早在他们来到郊区前就已被决定了。他们从诸多方面充分理解上海这座城市的重要，表示希望地方政权要维护法律和秩序，直到它的命运得到最终决定。

晚上，下起了雨。我们担心道路将无法行车。但是，我们已做好了明天返回石家庄和北平的准备。

2月24日 星期四。早晨，周恩来先生很早就来了。我们之间举行了一个短会，内容与谈判开始后应采取的步骤和应讨论的

方案有关。大约七午 11 点钟，我们离开了宾馆。返回时，车开得较快。因为小雨使路的状况有所改善，而且是下坡路。与石家庄市长及其同事第二次共进午餐后，我们登上了前往北平的飞机。当日多云，由于飞得很高，飞机仿佛是在大海之上，地面景致一点也看不到。可是，途中天空放晴，我们再次看到了下面的田野和河流，甚为高兴。飞机降落在西苑机场，十分顺利。我们返回旅馆，虽然很累，可是非常愉快；准备洗个舒服的澡，吃上一顿美餐。

就这样，我们完成了我们的冒险旅程，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位最高领导人，我们对这一经历非常满意。

2月25日 星期五。北平与天津间的铁路交通已恢复正常，可自由通行。由于每站都停，全程需 6 小时。车厢挤满了乘客，且只有三等座。由于窗户的玻璃都碎了，车厢内很冷。在拥挤的乘客中，扒手生意兴隆。

由于各民主党派代表从沈阳（原出发地是香港）来到北平，叶市长忙于迎接他们，抽不出时间来访。我们一行全体人员在饭店前留影。

当地的早报（现已减少为两家）发表了我们从石家庄返回北平的消息。

在石家庄之行的访谈中，我们非正式地起草了许多条文，都是关于可能进行的和平谈判的，诸如双方代表的相等人数，时间和地点（北平或石家庄），第一次非正式、秘密的意见交换，达成协议和立即付诸实施的一些问题，稍后处理的其他事项。还提出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如新政府的组织、贸易、工业、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宣布等。还谈到了分配土地给耕种者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双方似乎取得了一定的相互理解。

下午我们游览北海公园。在仿膳用茶；这里游客很少，只供应些花生、瓜子、饮料等，饭店尚未营业。

晚饭前，叶市长来访，通知我们，从沈阳来的民主党派人士已抵北平，明天将在怀仁堂（在中海冬宫）举行盛大欢迎会，我们都被邀请出席。随后，我们也向在北平的所有中共领导人发出了请帖，邀请他们在饭店共进午餐。在访问北平期间，他们给予我们以优

遇。

在饭店进晚餐时，我们遇到了上海航运界的代表魏文翰先生。他的轮船“大上海”号已抵达秦皇岛，装载有面粉，用来交换开平矿的煤。他与中国商船公司的天津经营者同被邀请到北平，与华北政府讨论有关事项。我们遇到其他商界著名人士，还有久大精盐公司和永利制碱厂的总经理。

2月26日 星期六。会见了许多来访者后，我们开始准备行囊，明天即将返回南京。飞机也在做飞行前的检修。

在饭店门厅，我们代表团全体成员与来访的客人合影留念。随后，进午餐，共计3桌。遗憾的是，未能吃上烤鸭。原因是，有更多的民主党派客人从沈阳来到北平，前门车站附近临时戒严，因此，烤鸭无法送到我们所在的饭店。

下午两点半，为民主党派人士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我和江庸先生到达会场稍迟了些，未听到前面的三个发言，李济深将军在开始时讲了话。后面11位的发言，我们都听到了。其中包括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乃器先生，还有冯玉祥将军的夫人。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谴责了国民党的假和谈和美帝国主义，以及南京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由于下午的会较长，我颇感疲劳，未能出席随后举行的宴会。

按照通常习惯，我们买了一些北京的食品，诸如蘑菇、银耳、果冻、果脯等。市长也送了同样的东西给我们，作为饯别礼物。

2月27日 星期日。我们的陪同者邵先生拜访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李济深将军，然后，我们离开饭店前往机场。叶市长到机场送我们。天气非常好，但刮起了大风，所幸的是，空气很清爽。沿途我们看到了半被白雪覆盖的泰山（海拔5000英尺），我们的飞行高度是8700英尺。我回想起20年前，曾登过泰山，半程徒步攀登，半程乘坐肩舆。此次飞行，途经济南、徐州、蚌埠（在这里我们收到了电报，通知我们在南京市旅馆过夜），越过长江，抵达南京。一路天气晴朗，飞完全程共用了3个小时。

机场上，很多人前来迎接我们。其中有白崇禧、吴铁城将军，还有于右任、吴忠信先生，以及李总统的代表和其他人。还有很多

带着摄影机的新闻记者，我们的秘书拿出了一份书面声明，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尽管和谈面临着许多的困难，但和平协议的达成是非常有希望的。

如此结束了我们前往解放区的和平使命。此行是由李代总统发起并主持进行的，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使其成功。至少，我们受到了出乎意料的欢迎，并就国家的总形势，与对方非常坦率、认真地交换了看法。我们更感到荣幸的是，结识了中共领导人。